

## 海南百年文化背影

对于海南来说,岑家梧是一个值得怀念声望卓著的儿子,他将自己母亲独特灿烂的文化奉献于世人面前

## 故园留待梦中看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岑家梧(前排左一)于1951年率中央访问团到海南时,访问王国兴(前排持枪者)。

和其他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一样,岑家梧对故土怀有深深的感情,或者说深深的怀念。不同的是,他将自己对海南的拳拳赤子之心更多的化为精深的学术研究和严肃丰满的著述。

曾受教于岑家梧的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评价说:“岑先生的乡土之情,既表现为强烈的伦理感情,又包含着对海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但具有深刻独到的理性内涵,而且体现在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海南各方面的问题,都在他的学术视野之内,他用有理有据、发前人之未发的文字,呈现给了世人。这些论著不但提升了海南人民的自信,而且也让人知道南溟奇甸是怎样地人杰地灵。”

## 一生研究系南溟

岑家梧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生涯正是从对故乡的研究开始起步的。最初,正是许地山的演讲引发了他对海南风俗的回忆,使他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1932年他与同乡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民俗及其他》,根据《岑家梧著述年表》,这是他关于人类学最早的著述之一。从此一直到1965年撰写的《明代嘉靖年间那燕领导的黎族起义》,在他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关于海南的研究始终是其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并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论述,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广东民族学院教授陈光良曾对岑家梧对海南民族研究的建树进行梳理,指出其研究成果为一般学者难以企及,主要在三个方面:关于海南汉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关于海南黎族的系列研究和关于海南三亚回族的考证。

岑家梧先生是最早从民俗学视角研究海南民俗文化的当代学者之一。在《琼崖民俗及其他》中,他将海南汉族的传统民俗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并将海南岛的人情风俗、移民史、人种及方言、宗教史、民间歌谣及传说等作为“琼崖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从理论方法上正确把握海南文化研究的内涵,现在看来依然是有启迪意义的。”陈光良评价说。岑家梧也是琼剧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并先后发表多篇相关论文。他从形成、体裁、内容、演出、戏班及其改良发展趋势多角度对琼剧进行文化上的深入阐述。

黎族研究是岑家梧对海南的研究中用力最深、著述最多的部分。李鸿然说:“先生对黎族的研究具有开山性地位,可以说前无古人,是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丰碑之一。”其中,在黎族族源的考证、黎族“合亩制”研究、黎族经济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黎族“吉贝”为代表的纺织史、历史上的黎族起义等方面,他都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述。直到今天,当人们研究这些问题时,都必然从岑家梧的研究中吸取营养。

除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岑家梧对海南的发展也非常关心。1947年,他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边政公论》上发表了《开发琼崖的一点意见》,分析了海南在国际上和经济学上的重要性,进而指出开发琼崖刻不容缓。他在60多年前饱

含拳拳赤子之心的先见,已经为历史证明。

## 海南桃李栽满园

中等个头,身体看上去很结实,但并不胖,戴着镶边眼镜,显得温文尔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在年逾花甲的陈振魁的记忆里,还保留着50岁的岑家梧先生在讲台上的形象。“那个时候他是学校里有名的大教授,讲课特别生动,基本不用看教案,到他的讲座旁听的学生特别多,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这些青年都是崇拜他的‘粉丝’。”

和研究学术一样,教书育人也是岑家梧毕生的事业。1959年,陈振魁作为调干生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中南民族学院)的时候,这里已经云集了不少海南来的学生,其中许多人直接受教于岑家梧,成为他满园桃李中的一部分,也在他的学风德行的熏陶下,后来成为建设海南的精英。

平易近人是陈振魁对岑家梧师风最深刻的印象。他几次到宿舍里和同学们聊天,又常常叫海南学生到他家里去,探讨学业,也说一说海南的事情。岑家梧知道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调干生,基础不好,就特别关心他们的学业。

长子岑龙记得,在中南民族学院的时候,父亲很好客,特别欢迎海南学生到家里来,和他们在一起,父亲就只说海南话。他和弟弟就在旁边跟着学。有的时候,吃过晚饭,父亲也会一边逗弄孩子一边教他们说海南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生活在武汉的岑龙还能在电话里说上一两句简单的海南话。

## 故园留待梦中看

从14岁离开故土,岑家梧只回过3次海南,1930年代一次,1950年代两次。其中50年代的两次由于公务在身,他没能回到老家澄迈永发镇看一看,只是和亲人在海口见了面,由此对家人发出了“故园留待梦中看”的慨叹。

离开故乡越是久远,对故乡的思念也就越深切。岑龙说,那个时候他们家里常常可以吃到海南的椰子、菠萝蜜等特产,都是岑家梧出差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海南带来的,告诉孩子们这就是老家的东西。心情好的时候,岑家梧还常常抱着小儿子岑鹰的小脑袋左右摇晃,说是摇椰子,听听里面有多少水。

岑家梧特别喜欢听琼剧,电台里一有琼剧播放,他就一定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一边听一边还跟着哼唱。有一次海南琼剧团到武汉演出,兴奋的岑家梧带着孩子去连看数场,又在家里宴请剧团成员。

虽然离家日久,但是岑家梧对故乡的一切非但没有陌生,反而更加熟悉和亲切。在两个儿子面前,他经常讲起海南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总是跟孩子们说,你们要记得家乡人。他总是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带全家人回海南岛老家一趟。

## 卓然大家岑家梧

(上接 B4 版)

## 卓然大家

如果将岑家梧的学术生涯分为3个阶段,《图腾艺术史》等3本专著可以视为第一个阶段,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宽广的视野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结合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让人瞩目的研究;抗战回国到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视为第二个阶段,他深深扎入了自己的研究土壤,像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一样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在实践中逐渐成熟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树立了自己在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第三阶段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他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成熟和拓展的阶段。毫无疑问,在岑家梧成为“大家”的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

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岑家梧卓然成家而离他远去。岑龙回忆说,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父亲和母亲冯来仪靠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的头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先后夭折。此时的岑家梧已近中年,失去孩子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这些都动摇了他献身学术的信念,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刻苦著述。

“西南是原始文化的展览会,又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它在人类学及文化史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陈序经为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所作序言中的话。抗战时期,众多知名人类学民族学家云集西南,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这也为岑家梧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深入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大西南,完成了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以来的夙愿。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中逐渐提出改变当时学界从西方角度对中国西南民族开展的研究,强调建立民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身体力行贯彻,对后来的中国民族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6年抗战胜利后,岑家梧回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岭南大学副教务长等职,并参与创办珠海大学,开始参与到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同时,西南田野调查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

这一时期的论著,以民族学为核心,同时又广泛涉及到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领域。其中的代表作如《水书与水家来源》,首次详细介绍了水族和他们独特的文字水书,成为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全面展示了布依族宗教活动的全过程,则堪称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传世经典。

## 戛然而止

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深受《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人类学著作的影响,岑家梧早在《图腾艺术史》等学术研究论述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唯物史观,对于引领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意识形态,很快就融入了他的学术研究中。

在工作上,岑家梧先是1952年奉派参加接收岭南大学,随后参与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调整并入新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1953年,奉命筹办广东民族学院,任筹备组副组长。同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即中南民族学院),后担任副院长。

在学术上,他多参加官方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1951年7月,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到广东北部和海南岛等地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6年,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赴海南作黎族社会经济调查,在调查组撰写几十万字调查报告同时,他先后发表《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等论著,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建国后到1957年,可以说是岑家梧生活条件最好的一段时期。据岑龙回忆,此时他已是著名学者,工资比较高,只要各地的朋友来,他都自费请客,又喜欢买书,常常接济人,尽管不时要做“月光族”,但也说明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同时,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时,社会学人类学已经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缔,一些著名学者如费孝通、雷洁琼等纷纷转入民族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岑家梧的学术研究受此影响,更偏重于民族学和历史学方面。他的学生徐杰舜撰文回忆,他一边在大学讲授古代史、艺术史等课程,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历史知识之中,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合理的论证,使学生能够联系本民族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一边参与新中国组织的民族调查,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直接的依据。

事实上,岑家梧对此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正如他所说,为“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对海南黎族经济社会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合亩制”的调查就是其中的典范。在他主持下,调查组撰写了38万字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及开发建设黎族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提供了珍贵的范本。

在展开海南黎族的民族调查之初,岑家梧制定了四至七年的全面调查计划,力求使之成为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样本。遗憾的是,第一阶段调查刚刚获得各方肯定,他就陷入了“反右”政治漩涡,少数民族调查也就此中断。1958年在全国民族工作科学讨论会上,他被点名批判,在批判名单上位列“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首”的费孝通之后,成为“大右派”。两个名字在30年代的“南岑北费”之后再次并列,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

1960年元旦,岑家梧“右派”帽子摘掉了,从下放的农场回到学校。此时正就读于中南民族学院的李鸿然回忆说,他在历史系、政治系担任民族史和民族志教学,后到民族问题研究室从事专题研究,去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论做什么,先生都一如既往地带着天降大任般的心态和热忱。”他先后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以及一些重要的论文。1965年夏季,他借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之机,千方百计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在日后教学与研究中使用。

然而,岑家梧终究没有逃离政治运动的阴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而至,岑家梧首先受到冲击,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情的批斗和迫害。9月4日,一代大师陨落,年仅54岁。在离世之前,他已经规划好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等重要的著述计划,最终只留下了部分篇章。

“尚未完成的天才”,这是不少研究者对岑家梧的评价。然则,他已经用自己无比的勤奋和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社会现实和历史,终究成为一代文化大师。在他不长的生命里,人生展示给他的坎坷曲折几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年父母双亡、中年丧女之痛、长期经济窘困、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意外劫难……种种厄运,都没有阻止他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正如李鸿然所说:“从岑先生身上,我们最鲜明最直接地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和他辉煌的学术成就并列于海南的文化天空中,熠熠生辉。



岑家梧著作